

文 化 人 类 学 笔 记 丛 书

王 铭 铭 著

山街的记忆

一个台湾社
区的信仰与人生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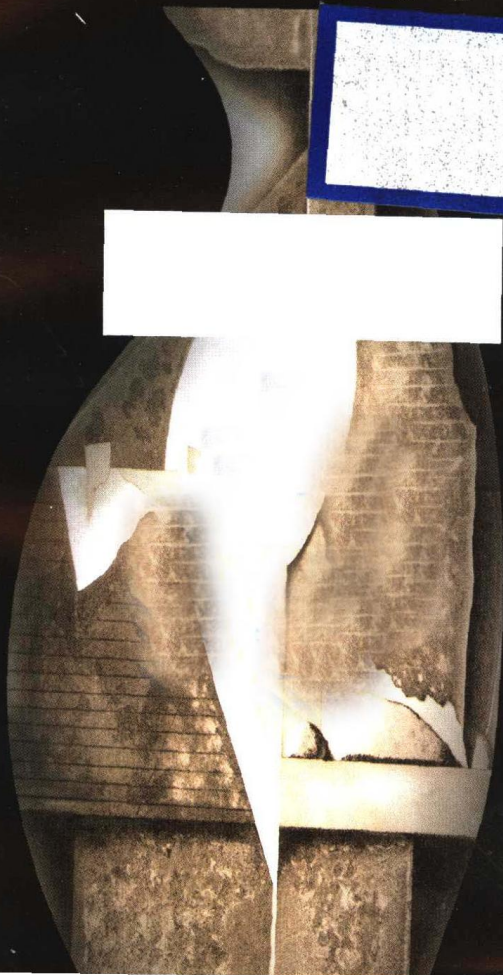


王 铭 铭 著

山街的记忆

一个台湾社
区的信仰与人生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周艳梅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山 街 的 记 忆

——一个台湾社区的信仰与人生

王铭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03,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0795-7/1·634 定价:9.00元

编者献辞——

“地球村”的概念使地球“变小”。

人类,不,严格地说是“人的家庭”却在变大。西文 family 在人类学里面可归到“人科”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里来看待。

人类生产和生殖的直接后果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讲究欣欣向荣、人丁兴旺。家庭伦理讲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行最通俗的说法却是人口爆炸。无论人口增长带给社会“正值”还是“负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只理解到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聪明起来,从而与其他生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学有一个普通的术语“图腾”(Totem),原系印第安方言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这个术语之所以波及面这么宽,因为它说明在人类原始阶段,普遍存在一种将自己与其他生物放在一个不分彼此的层面上来认识,某一种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植物也就成了“亲族”。今天,人类的这种认识已经远去、疏淡。因此,无论从生物的进化还是思维发展的意义看,人类变大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人早已经不再新鲜。它替代了人类繁重的工作,它的有些“本领”远比人类大得多。再比如最近“克隆羊”技术的出现,把人类带进到可以复制其他生物甚至人类自己的阶段。人们相信,只要愿意,人类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在生物领域“制造”出以往人们只在神话中听见的“半人半兽”。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了解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物。今天的航天飞机飞到地球以外的星体上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人类除了了解其他事物,还有一项任务

——了解自己。人类有两大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性。“社会人”的精彩之处在于其文化。文化可以将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从国籍上区分开来；可以把汉族人、苗族人、纳西族人在族性上区分开来。甚至可以进一步把这一地域、这一人群与另一地域、另一人群从习俗等方面区分开来。文化可以将自己与祖先进行历时性串联；也可以作你、我、他的共时性比较。这一切无不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提升到了空前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变大了。

人需要不断地了解自身，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类学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

在中国，人类学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说它老，指学科的思想依据可以上溯远古。在西方，“人类学”由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则诞生在十九世纪中叶。怎么说，它也是位皓首长须的世纪老人了。说它新，一是指人类学属于标准的“舶来品”，来中国已是晚近的事情。本世纪初，我国就有一些学人致力于将这门学科介绍、引入，教学和研究也同步进行。也出现了一批影响力波及海内外的

大学者。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是一门迟到的学科。二是由于人类学在西方的产生与殖民主义扩张一并形成,殖民主义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学的职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这个“婴儿”便一度与殖民主义“洗澡水”一起给倒掉了。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人类学才重新在中国复兴。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完全是一门新学科。

人类学同时是一门“大”而“小”的科学。说它“大”,一则指凡属人类之事务、事象、事理皆可纳入。二是指人类学研究强调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这使得其他学科无法在这个高度上与之比拟。说它“小”,指人类学研究要求从最具体、最细微处入手,讲求实地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作业”;讲求参与观察;讲求长时间与被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身体力行。这一切决定了人类学调查资料的真切和细致。用“以小见大”来说明人类学的品质再合适不过。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科学。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人类也就越需要正视自我。可惜,长期以来,出现了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家们的

专利品的倾向。从广宽的“田野”走进庄严的学术殿堂,致使一般百姓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品质。

有鉴于此,目前一批相当活跃的我国中青年人类学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达成一个共识,将人类学在中国的普及当作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并在 1996 年 8 月间,发起和策划了这一套“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我们的设想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我们将良好愿望变为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真诚希望,人类与人类学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编委会

1997 年 3 月

目 录

1. 山街的来历(1)
2. 当世的往昔(10)
3. 神圣的世俗(20)
4. 文化的危机(31)
5. 心灵的医治(45)
6. 神异的权威(62)
7. 地方的头人(77)
8. 历史的精英(88)
9. 群体的动力(108)
10. 理论的反思(130)
11. 界限的超越(146)
12. 日常的英雄(161)
13. 交织的动力(172)
14. 本土的观念(188)
15. 社会的人生(199)
16. 山街的记忆(217)

后记(227)

1. 山街的来历

1995年7月27日,我乘坐中国民航班机抵达香港,在港岛友人家小住三日,转乘国泰航空公司班机于7月30日抵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傍晚,住进友人早已代订的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次日下午,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光临我下榻之处表示关怀。礼尚往来一番之后,李先生问起我此行的目的,我的回答是:“来台湾从事田野考察。”事实上,我并不是来重新开拓一个新的田野考察地点,而是要寻找一位师长辈的英国友人的旧地。

三十年前,一位德裔英籍的年轻汉学研究者 Stephan Feuchtwang 在牛津大学写完了一篇关于中国风水的硕士论文,为了进一步理解中

国文化,他转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兼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位老师那里学习了一年人类学理论之后,他面临着所有人类学者进入学科门槛所应经历的人生考验。

人类学者把这个考验称为“人生礼仪”(rites de passage)。原来,“人生礼仪”指的是为了使人在其生命的发展周期中过渡成年、婚配、就业等等“关卡”所组织起来的仪式活动。对于即将成为职业人类学者的人来说,这个词汇则指其职业要求所需进行的关键性学术活动,即通常称之为“田野工作”(fieldwork)的实践。“田野工作”的意思就是“实地考察”。不过,它指的不是简单地到一些地点进行蜻蜓点水式的短期访问,而是指在同一个小型社区进行一年以上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这就要求人类学者在其田野工作过程中在一个特定时空坐落中与当地日常生活和一般民众构成亲密关系,通过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从而体验当地的社会生活,获得一套能为人类学分析所用的“地方性知识”。

作为一位即将被训练成为专攻中国文化的

人类学家,Stephan 同样需要到一个中国人的小社区中去从事田野工作。人类学与一般汉学研究不同,它反对学者们只停留在字面上来了解中国人,反对把视野局限在中国社会的上层文化,推崇一种走向民间的实地考察态度,力求从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中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为了做到这一点,Stephan 必须到中国的某一村落中去生活。

可惜的是,正当他在准备前往该去的那个地方时,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来自“老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学者持敌视的态度,把申请来华从事长期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界定为“特务”,将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一时之间,对于西方人类学者来说,中国广阔的文化大地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原野。于是,一大批像 Stephan 那样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青年面临着人生的难关:为了理解中国并从这种理解中获得进入学界的“牌照”,他们需要中国的田野工作;可是,中国在当时是封闭的,与西方世界处于“冷战”状态之中,田野工作完全不可能。

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与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尚存有“历史性友好关系”的美国

在康耐尔大学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训练活动,召集欧美的青年人类学者前去学习台湾话(闽南语系之一种)。就在1966年之后,一批学了一点台湾话的青年学者(包括Stephan)先后来到台湾,力图通过台湾社区的田野工作来理解中国文化。他们的考虑是,台湾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了解台湾的乡村就等于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和民众文化。

Stephan初到台湾时,住在以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姓名命名的街道“罗斯福路”。他想取一个汉名,一位好心的台北朋友说:“不如就取名‘斯福’。”Stephan的姓是与中国姓“王”相近的德国姓“Feuchtwang”,因而也可以加上“王”,于是便成了“王斯福”了。

当时,王斯福这位人类学青年是一位反叛的人士,他爱好学术创新与批评。他的老师弗里德曼专攻亲属制度与中国宗族的研究。王斯福偏说,中国人的社会不一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也许地缘关系更为重要。在台湾的初期,他借在台北停留的期间收集了一些地方制度的资料,使他明白中国人的基层社会复杂多变,存在血缘关系纽带,但更多的是同乡、契约、

地缘的关系。台北的庙宇组织就体现了这些非血缘关系的重要性。

为了服从一般人类学的要求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他需要选择一个小型的田野工作地点。最近便而又具有一定自我分立特点的村落就分布在台北东南部的盆地边缘一带的山地里。其中,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民风淳朴,传统敦厚,十分适宜人类学者的口味。于是,就被王斯福先生选定为田野工作场所了。

这个小镇名叫“石碇乡”。二百多年前,山街乡还是一片原始森林,只有少数高山族原住民散居此地。清朝咸丰年间,福建南部的闽南人从台北城移居此地,开荒垦荒,种植甘薯、水稻、茶叶等农作物。“石碇”名称的由来,系因该地溪中巨石累累,人们出入常需跨越横卧于溪流中的大石块,犹如跨越旧式房屋大门的门槛一般,而闽南人称门槛为“户碇”,因而得名(图一)。这个民间地名后来被日据时代(1895 - 1945)的日本统治者沿用,称“石碇乡”,下属山街、格头、枫林三区。1920年实施地方制度,三区合为一庄,隶属台北州文山郡,全庄划分为十五保,设保正,实行基层行政。1945年,台湾光



图一：山街境内“石碇”磊磊的小溪流

复后，由台北州接管，改称“石碇乡”，将日据时期的十五保并为十一村。1975年，又改为十三村。石碇人口在1941年时有8,000多人，至1966年王斯福来到此地时达13,342人，其后由于人口外流及老龄化，逐步趋于下降，现有人口7,285人。该乡的市场中心和行政中心在石碇村（十三村之一），是由两条小街组成的小街镇。

王斯福先生的田野工作，就集中在石碇村一带，并未包括山街乡全部。在他后来写出的博士论文和许多学术作品中，王斯福给这个特定的田野地点取了一个学名叫“Mountainstreet”，

即“山街”之意,生动地表现了这个地方的特点,它的确是山里的一条小街。

1966年至1969年间,王斯福先后住在山街达两年之久。他的住处不是一栋豪华的别墅。当时,这种居所并不存在,只是到了二十年之后才逐步兴建起来。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还十分落后,山街居民的生活还处在贫困状态。据王斯福的回忆,当时的住房都很破旧,家庭的住所狭隘而无法容下他这个外来人。加之国民党对欧洲来客抱有怀疑之心,以为他们较“亲共”,人们对他们敬而远之,不敢收留。这使青年王斯福初次感受到人生的命运差异。他曾对我回忆说,田野工作给他的一大心灵冲击,就是使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同属人类的物种,台湾人和英国人却有如此不同的命运:“为什么当英国人正在享受富贵之时,台湾的中国人却生存在贫困的边缘,而大陆的中国人却还在革命?”此外,由于有所谓“命运的差异”,因此他只能长期住在当地的公共场所村庙中。

不过,正是在这个普通的台湾乡间小庙中,王斯福获得了他在英国难以得到的体验。他在这里体验了台湾的一般中国民众的宗教文化生

活,写出了大量有关其观察的人类学论著。而我到山街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他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番自己的见解。当然,我这样做并非是要推翻王先生的理论。事实上,我的此行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经过了王先生和我自己之间大量沟通、商量之后设计的。

1987年至1992年间,我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一开始,我的老师给我安排了许多人类学理论方法课程,如社会人类学基本原理、人类学当代思潮、亲属制度、仪式与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等。此外,他们还一致推荐我去参与伦敦中国研讨会的周四讲座。这个讲座不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方面,而扩大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讲座人也来自四面八方、各种职业,有欧美学者、中国学者甚至俄罗斯学者,有社会科学家、记者、艺术家。据说,伦敦中国研讨会已经存在十几年了,而从它的创办到延续,都是王斯福一人的功劳。这位已经广为汉学界和部分人类学者所知的中国学家,利用个人的存款和少量基金资助,创设了一个英国的中国研究论坛。